

印刷史界的不老松

——嵊州访张秀民先生记

张志清 李小文

今年4月南下赴浙前，接《文献》主编王菡同志电话，询问浙游途中是否能顺便去嵊州探望张秀民先生，这正是善本部几天来议论的事。虽不知路途是否艰难，交通工具如何解决，但事情问到头上，还是答应了下来。张秀民，这位在印刷史界鼎鼎大名的老人已是94岁高龄，近年还不断有著作问世。记得每到春节前，都会有一封寄自“嵊州瞻山廿八都张秀民”的贺年信出现在国图善本部的信箱里，信上的祝福简单平易，但工整有力的笔迹却让人感到即将迈入又一个春天的那棵老树依然旺盛的生命力，令人肃然起敬，也激起我们探询的渴望。

翻开地图看看，嵊州就在绍兴南面一点，给人的感觉是只要从兰亭再走几分钟就能到达那里。出发前两天，从王菡处送来两样东西，说是带给张先生的：一个手炉为他冬春寒冷时取暖；一叠厚厚的信纸专供他写作。后来才得知，这两件礼品是如此迫切和适用，好象给老人量体裁剪缝制的棉袄，很能令他感到温暖。老干部处和善本部也整理了几样礼品，包括生活用品、书籍、笔记本和500元钱。所有这些东西满满打了个纸箱，出发时，心里不知是轻松还是沉重。

到杭州后，知道去嵊州的路途并不近，从杭州过去至少要半天才到。浙江古籍出版社的徐忠良主动要求开车陪我们一起去。忠良是嵊州崇仁镇人，和张秀民同镇不同村。“虽然是同乡，近在杭州，都从事古籍专业，可从没见过张先生，这次可以借你们的光去看看他。”忠良憨厚地笑着，让我们心中充满亲切感，一切仿佛都是上帝安排好的。

当小轿车以120迈的速度驶向嵊州的时候，心情终于放松下来。一个多小时后进入嵊州界时，山高，林密，右边还出现了无水的深沟，里面有大型机械在挖沙石。忠良从前座回过身来说，这沟就是著名的剡溪了。我们都很吃惊，难道这就是“青山行不尽，绿水去何长”的剡溪？难道这就是那条所谓的“唐诗之路”吗？

剡溪一带地方，自古以来就是名人高士雅会卜居之地，与谢灵运、李白、杜甫等大诗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有人统计，唐代共有 312 位颇有声望的诗人先后入剡，留下数百首诗词，是名符其实的“唐诗之路”。据忠良讲，嵊州又称“天台门户”，南北朝时山高林密，鲜有人迹。民间传说天台之路是由谢灵运踏出来的，他穿着那双被称为“谢公屐”的带齿木鞋，一路披荆斩棘，开出了一条“谢公小道”。李白于天宝元年离长安游吴越，为的是入剡探询谢公足迹。他一夜间就从鉴湖舟行入剡，“谢公宿处今尚在，绿水荡漾清猿啼”，伴着万里风尘而来的李白感到了无限满足。

唐代大诗人们为什么特别钟情剡溪？杜甫说“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这“秀异”在哪里？白居易是这样解释的：“东南山水，越为首，剡为面，沃州天姥为眉目，夫有非常之境，然后有非常之人居焉。”看来剡地自古就是人杰地灵的地方。汉代，剡人刘晨、阮肇上山采药遇仙的故事流传很广，给剡地涂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东晋时，十八高僧之首西天竺僧帛道猷爱剡之秀，结庐瞻山。他之后，高僧竺法潜、支道林、支道开、竺昙猷等先后游憩剡地。这样看来，嵊州最早应该是佛教传播的一个基地，无怪精通番语的谢灵运也选择隐居在剡溪口。东晋永和十一年（公元 355 年），王羲之携子由会稽迁居剡地金庭，终老瀑布山。大儒士戴逵、戴颙踵右军定居在此著《五经大义》、《老子音》。这些高士优游山水，恬淡为生，著书立说，传播思想，探索人生奥秘，使剡地成为东南思想之邦、灵秀之地。今天的嵊州承袭古风，造就出一批栋梁之才：经济学家马寅初、医学专家沈克非、水利专家宋希尚、地理学家丁谦、机械工业专家支秉渊、实业家袁涤庵、山水画家郑午昌、音乐家任光、作家魏金枝、越剧表演家袁雪芬、围棋国手马晓春等都来自嵊州。忠良说，仅廿八都一村，在全国名牌大学任教的就有十几人。去年浙江的高考状元也出在嵊州。众多人杰中，当然忘不了在印刷史和安南史研究上作出过卓越贡献的张秀民先生。

廿八都是个大村，车到此经过一段土路，停在热闹的拐角处，乡人都知道张秀民，他们指着一片老房子说：“不远，向前走就是了。”

鹅卵石地面、方方的池塘、白墙黑瓦、破旧的木门，在三月阳光照耀下散发着慵懒的气息。池塘边咄咄的捣衣声和偶尔两三声鹅叫让这片村落更显静谧。我们试着推开门，里面是三间老屋，环抱着一个不大的天井，阳光温柔地照在天井

中一个老者的脸上，他身穿灰布中山装，坐在藤椅里。见有人推门，他惊愕地站起，慢慢移动脚步向我们走来，老者就是张秀民先生。

他 94 岁高龄，居然能够不扶拐杖走路；看书时不带眼镜，也不必把书举到眼前或离得很远。他能听见、听懂我们说的每一句话，表达虽有些吃力，但思路依然清晰。他座椅背后的厅堂，墙上黝黑斑驳，早已没有了中堂和对联；堂中旧物杂陈，也没有了讲究的格局。厅堂正中横着一张老式写字台，上面堆满了很破很旧的日用品。一把木制太师椅紧靠在张先生座椅旁边，椅子上凌乱地放些大小不一的纸头，十几张一处，用铁夹子夹住。张先生很在意地拿起一夹给我们看，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这是我最近在写的一篇文章，谈中国的发明。”老人说起他的作品，开始滔滔不绝了。这时我们才发现，那张太师椅，就是老人的书桌；凌乱的纸头，就是老人的稿纸；撒满阳光的天井，就是老人的书房。一位老学者，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清贫自守，甚至王菡带来的厚厚一摞稿纸，也成了最高级的奢侈品。

谈话中得知，张先生目前和他 91 岁的妹妹相依为生，他们的卧室四面透风，阴冷潮湿。里面有两张老式大床，头顶头放着，每张床上都有至少三层厚被。“去年冬天特别冷，春节的时候就得了病，晕过去了。乡人把我送去抢救，又活过来。”老人的外甥韩琦博士，当时远在德国，为了让老人生活得好些，特地在天井的一角盖了间房，样式虽也是老式的粉墙黑瓦，但铝合金的窗户很大，很严实，便于阳光照进来。房顶上装了热水包，可以洗澡。“下个月就搬进去。”老人很高兴地说。他感谢我们带来的 500 元钱，“这钱已经足够了。”老人的话，让我们心里感叹。

张先生记忆力很好，他询问老北图的同事，也关心现在善本部的工作。当他得知我们想收集他的手稿时，兴冲冲地带我们爬上阁楼。在一堆手稿和笔记中翻检着，拿出一些整齐的交给我们。过去，张先生曾将他在印刷史上的代表作手稿交给国家图书馆收藏；这次拿出来手稿，是有关安南史的几篇重要文章和著作，大部分写于民国时期。看着手稿上工整文雅的字体，我们的思绪飞到了张先生的过去：

张秀民生于清光绪 34 年（1908），谱名荣章，字涤瞻。其先祖南宋初就居住在嵊县升高乡廿八都村，祖父、父亲曾在家里设私塾教书，家境贫寒。张秀民年轻时在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开办的宁波四明中学读书，学到黄炎培《陈嘉庚先生毁家兴学记》一文，对陈在福建厦门兴办学校的壮举十分钦佩，投考厦门大学文学院国学系被录取。在厦大期间，他听孙怡让的弟子李笠讲授《汉书·艺文志》，从此对目录学发生了兴趣。一次，张秀民在图书馆的书架上看到一本英国霍氏写的目录学入门书，看得入迷，不忍释手，了解到许多有关西洋版本学的知识。他在厦大读书时曾发表了《评四库总目史部目录类及史部杂家类》和《宋刊本和摇床本》（摇床本又称摇篮本，是西方对早期印刷品的称呼）两篇文章，后者议论宋刻本与西方 15 世纪摇篮本的异同，把印刷史放在世界的范围内进行研究。张秀民毕业时，老师李笠将他的这两篇文章寄给了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袁看了两篇文章后，当即由馆方名义来信，请张秀民速来馆。1931 年 6 月底，北图新馆举行落成典礼。四、五天后，张秀民在北图上班，开始了长达四十年的图书馆生涯。

张秀民初进北图，在中文编目组从事古籍编目工作，每天 5-6 种。他编目时要看原书内容，查阅大量资料，编目质量很高。他留意到向达翻译的美国卡特教授所著《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认为外国人写的中国印刷史，虽旁征博引，但未能探及根源。自己身为中国人，心有不甘，于是立志要写出一部中国人自己的印刷史。从此在编目同时，很注意收集有关版本印刷的资料，把信息多记录在草片上，再誊抄成大小笔记约 70 多本，其中有《宋版书经眼录》二册、《宋刻工名录》二册。他还利用工余、午睡和星期日，翻阅了馆藏全部 355 种宋版书、200 册《永乐大典》、数千种地方志、诗文集、笔记杂论，以及西文、中文版本目录学书籍。

“七七事变”之后，张秀民到馆上班，看到馆门口有日军把守，深感国家危亡之时，书皮之学并无实际用处，从此转而研究安南史。他以十余年之力，用北图藏书辑录成《安南内属时期职官表》和《安南内属时期名宦传》两稿，他说后一部稿“可作一剂爱国药”，可惜两部书稿均未付梓。

1952年10月，北图举办了“中国印本书籍展览会”，其中许多是现代著名藏书家新捐献的珍本。副馆长张全新（铁铉）希望写文章介绍一下，于是张秀民写了篇《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对亚洲各国的影响》，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后又被《文物参考资料》转载，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嘉许，也鼓励张秀民重新拾起弃置多年的版本目录学和印刷史研究。195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秀民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日本学者神田喜一朗读后，称赞该书是“一部真挚诚恳的好书”，并嘱广山秀则译成日文，于1960年在日本京都出版。美国、苏联的刊物上也纷纷刊登书评予以介绍，国内某些大学图书馆系也用此书为课本。但张秀民认为该书只是《中国印刷史》的首尾部分，而其中主题远未讲透。1963年，张秀民又出版了《活字印刷史话》，后扩充为5万字，改名为《中国活字印刷简史》，未几因“文革”浩劫开始，未能出版。“文革”期间，张秀民被批斗，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多年积累的书刊资料损失很大。他1971年申请退休，回原籍奉养老母，这时他在北图工作已经整整40年了。

退休返回原籍后，张秀民在艰苦条件下继续从事《中国印刷史》的写作。乡间没有参考书，连人名、地名词典都要到县城去借，有时要步行去崇仁中学借《明史》、《文物》杂志等。张秀民能够充分利用的，仅有手头上的70多本笔记。80年代初，他每年都要跑杭州，在浙江图书馆查阅资料，边改边写，写作进展缓慢，象明藩府刻书就先后改写了六、七次之多。冬天寒气袭人，夏天暑热难耐，张秀民仍坚持写作，让老母看了十分心疼。《中国印刷史》历经艰苦，终于在1984年完稿，198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54万字，详尽介绍了中国印刷术的发展历史、各个时代的刻书特点、刻书内容、版刻特点，以及刻工、印工的生活和事迹。书中还提供了与印刷有关的版画、年画、报纸、纸币、纸墨资料等，被誉为有关印刷术的“最完备而系统的综合之作。”

1994年，张秀民又重写了《中国活字印刷简史》中的活字的形式与内容部分，附录了活字印本目录约2万字，他的外甥韩琦博士也补充了19世纪外国人对中文叠积活字的研究，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印刷术，以及亚洲各国与中国活字印刷的关系等。1998年4月，两人合著的《中国活字印刷史》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张

秀民先生平生无他嗜好，惟研究印刷史和安南史，耗费了几十年的心血，在这两个领域作出开创性的工作，取得了令人敬佩的成果。

1975年，张秀民重返北图查阅资料时，曾将明武林观妙斋刻本《商子》、清抄本《光绪丙申王公侯伯文武大臣生日地址考》等8种书捐赠国家图书馆，近年又将他的15种手稿捐给国图。他对于图书馆事业的热爱是始终如一的。

从张先生家告辞出来时，先生特地嘱咐我们一定要顺便看一下瞻山。瞻山倒也不远，从廿八都村出来，不到两里就到了。说它叫山，实际是个小土坡，相对高度不足40米。但山的两侧都有潺潺流水，山上松柏森然，鲜花盛开。瞻山自古有名，是因为它是帛道猷涤巾、择居之地。现在，山门横额是顾廷龙手迹，亭中对联是李希泌所写，碑文为张秀民所书——一座瞻山，到处都是图书馆界前辈的手泽。由此我想到了结庐在此的张秀民，他的字“涤瞻”，应该就来自帛道猷涤巾瞻山的旧事。正因为有他的存在，今天的瞻山在我们眼里才别有一种灵秀之气。我们站在这里，谈论着张先生，谈论着他在中国印刷史上的贡献，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



和张秀民先生在一起